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小说界革命的 兴起与发展

付建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小说界革命的 兴起与发展

付建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付建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5004 - 6694 - 9

I. 小… II. 付… III. 小说—革命—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0043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涟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302千字

定 价 2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关爱和

“小说界革命”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核心，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意义之深，都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所不及的。“小说界革命”从发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研究的人才之众，发表的论文之多，也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研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所有这些成果对于“小说界革命”，尤其是对于“新小说”和新小说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难以看清“小说界革命”的全貌，如哪些人参与了“小说界革命”，促使它兴起与发展；“小说界革命”是如何进行的；它兴起与发展的社会条件有哪些，对社会有哪些影响；在小说创作与翻译方面取得哪些成就；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关系，等等。也就是说，学界缺乏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整体考察。

把“小说界革命”作为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来考察，比较难以把握。建舟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来研究这场文学革新运动，考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选择这一角度比较独到，从而使对小说界革命这场运动的考察落到实处，避免空洞的叙述和武断的结论，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从“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小说界革命”的展开（期刊小说的生产与小说

期刊的传播)、“小说界革命”的作者群、“小说界革命”的巨大成就(包括小说理论、新小说翻译与创作、小说界革命语境中的近代戏曲等)以及“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承续性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试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这场文学运动的全貌和一些重要特点,以便总结出一些规律。第三,研究者在其他诸多方面也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如认为上层社会、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是小说界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一;对期刊小说的生产机制与小说期刊的传播状态做出实证性研究;对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即士—知识分子“半新半旧”特点的揭示;对晚清的小说(文学)观念即进化小说观、功利小说观、反映小说观、史学小说观、游戏文学观、审美文学观、比较小说观等的论述,尤其是推崇“比较小说观”的现代性特征;对晚清一些小说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特征的归纳;对晚清不同的小说类型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以及翻译小说等的阐释;对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革命之间历史承续性的研究,等等。第四,采用多种研究方法。首先,作者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把小说界革命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描述,并注重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还采用“典型现象”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并注重“比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论著避免了单一研究方法带来的偏颇与流弊,也符合小说界革命的实际状况。该论著系付建舟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历时六载,数易其稿,充分表现出作者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此论题与“古今中外”广泛联系,难度甚大。付建舟在论著的写作过程中,认真阅读了大量文本资料,在许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在复杂的关联中抓住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书是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小说界革命”的论著，在类似问题的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学术突破和贡献。不足之处是小说界革命的进程有待继续挖掘，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有待继续深化。该书的出版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少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对这场文学革新运动及其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作为付建舟的博士导师，我对他应该说是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他具有虚心好学的求知态度，拥有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他的思维比较活跃，学术眼光比较敏锐，独立科研能力较强。博士毕业不久，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在站期间，不仅凭借复旦的学术平台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与补充，还顺利完成三十多万字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同时成功申报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除了本书之外，他还即将出版《中国文学思想观念的近现代转型》和《通俗与叙事——中国近现代转型中的文学理论》。作为青年学者，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我希望他再接再厉，更加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7年11月30日

目 录

序	(1)
绪言	(1)
一 “革命”与“小说界革命”释义	(1)
二 “小说界革命”研究的历史回顾	(9)
三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18)
四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21)
第一章 “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24)
一 上层社会的救亡运动与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	(25)
二 废科举、兴学校、办报刊与中层社会的启蒙运动	(37)
三 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公共领域的形成	(44)
四 清政府对出版的控制与社会各界的反控制	(53)
第二章 小说界革命的作者群	(61)
一 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	(63)
二 《新小说》杂志的多元作者构成	(67)
三 小说界革命的开拓者	(75)
四 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近现代转化	(90)

第三章	小说界革命的展开：期刊小说的生产与小说期刊的传播	(108)
一	小说界革命与四大小说期刊之关系	(108)
二	四大小说期刊之概貌	(111)
三	期刊小说的生产机制	(115)
四	小说期刊作为传媒的特点	(120)
五	小说期刊在晚清社会的传播	(125)
第四章	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上）：晚清小说（文学）观念与类型研究	(136)
一	晚清小说（文学）观念的近现代转化	(136)
二	晚清小说类型的近现代转型	(159)
第五章	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下）：晚清小说的作品类型研究	(174)
一	晚清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小说	(174)
二	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	(195)
三	借古寓今以小见大的历史小说	(214)
四	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翻译小说	(233)
五	晚清小说的叙事与文体特征	(256)
第六章	小说界革命语境中的近代戏剧	(282)
一	戏剧与小说一体化	(284)
二	对戏剧的大力倡导	(288)

三	戏剧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293)
四	借鉴西方现代戏剧	(297)
第七章	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承续性 ...	(305)
一	别开生面的文学革新运动	(306)
二	承上启下的《新生》文艺运动	(313)
三	另辟蹊径的五四新文学运动	(334)
结语	(352)
参考文献	(361)
后记	(375)

绪 言

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即《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为依托来研究小说界革命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本书拟从小说界革命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期刊小说的生产与小说期刊的传播、小说界革命的开拓者、晚清小说理论与批评、晚清小说的主要类型、小说界革命语境中的近代戏剧以及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关系等七个方面展开，从表层到深层，从文学运动的外部环境到文学的内部因素，逐层探讨分析，企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这场文学运动的面貌和一些重要特点，以便总结一些规律，为进一步认识晚清文学作出新的贡献。

一 “革命”与“小说界革命”释义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1902）里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他已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何谓“革命”？一般辞书解释说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易经》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里的“革”是剧烈变化的含

义，“革命”是指用暴力方式来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成汤灭夏建商，武王灭商建周，为历代政治家、史学家所首肯。何以如此？因为汤、武革命被认为具有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基础则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即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与文化统治属于专制性的，对于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解释具有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特点，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暴力行动的合法化至少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之嫌。在反对专制的时代，这种合法性基础自然会逐渐丧失。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对于诗界，他说：“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歌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①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此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②对于文界，他认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的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其文“雄放隽快”，使文界别开生面。“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1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1页。

不起点于是也。”^① 他要使诗文具有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从而获得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文的崭新特质。梁启超创造的报章文体风行一时，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② 胡适指出其特点和影响，“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③ 采用的措施，不是全部推倒传统诗文，而是在传统诗文中“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这不是一脚全部踏倒，完全重来的“全盘西化”的激进做法，而是逐步改变的渐进过程。那么，是不是说古典意义上的“革命”是“激变”，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渐变呢？我们继续看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的论述：“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楚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此处“革命”的含义超出“渐变”的范围，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激变”。如何对这个意义上的“革命”进行言说，是困扰作为维新左派的梁启超的关键所在，他不愿做一个保守的维新派，又恐惧暴力革命；主张渐变，又急躁地突破其边界，趋于激变。这种矛盾的心态迫使他写《释革》一文，企图对“革命”一词作出清晰的解释。“‘革’也者，含有英语之 Reform 与 Revolution 之二义。”“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Revolution 者，若转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③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轮然，从根木氏？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日本人把前者译为“改革”或“革新”，把后者译为“革命”。梁启超认为把后者译为“革命”不准确，以“变革”代之。他辨析道，Ref. 主渐，主部分，为累进之比例；Revo. 主顿，主全体，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远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 Ref.。”相反，“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此者，利用 Revo. ”。前者为改革，后者为变革。

中国古代的“汤、武革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日本的明治革命（即明治维新），虽然都使用“革命”一词，但内涵不尽相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其他三者都是政治革命；“汤、武革命”是换汤不换药的王朝更替，其他三者都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汤、武革命”与法国的大革命是王朝之间的暴力行动，具有激变性质；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温和的社会政治变革，具有渐变色彩。梁启超试图对不同意义上的“革命”加以区别，但仍然难以言尽。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企图引进日本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即非暴力的，具有实质性的、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梁启超并不认为明治维新是渐变）。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其他群治领域的革命都基于此。

梁启超警惕“革命”一词古典意义的消极影响，企图对现代意义的“革命”重新命名。但沿袭已久的用法难以改变，经过深思熟虑，只好对“革命”重新界定。他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指出：“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异动与此前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和平得之以铁血得之

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革命”的“最广义”和“次广义”中的和平方式，属于渐变范围；“次广义”中的“铁血”方式和“革命”的狭义属于激变范围。这类似于霍布斯鲍姆提出的所谓“双轮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前者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后者是科技动力和社会改革的渐变过程。但“双轮革命”不能完全表达梁启超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他理想中的“革命”，唯有这种“激变”、“渐变”的交错分类，才能传达他的含义。尤其是作为文化变革者的梁启超，其变革主张不是界限分明的“双轮革命”所能言说的。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把中国传统小说推上审判台，认为传统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因为它的毒素弥漫社会，毒害民众。“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而“小说界革命”就是要革除传统小说之命，革除传统小说中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兔之思想”，^① 换之以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以振国民之精神，以开国民之智识。由于中国人缺乏团结精神，缺乏集体精神，更缺乏民族主义精神，长期积弱，国势危机，不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难以救国。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的目的在于改良中国群治，“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② 按理来说，文化的变革应采用渐变的方式，不能采用激变的方式。激变的方式不仅难以建设新文化，而且还会损坏旧文化。有学者指出：“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进来应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

② 同上。

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历史的连续性确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却并不能避免这些拖住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限制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骤。”^①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时的激进态度是操作层面的矫枉过正，但文化固有的惰性具有一定的反弹作用，二者交锋，会抵消或部分抵消“过正”之力。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状况几乎如此。

“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是在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其实，这种思想有个酝酿的过程。如果我们溯源而上的话，就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897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严复与夏曾佑1897年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1897年的《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以及傅兰雅1895年的《求著时新小说启》等文章。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肯定了“政治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并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② 在《论幼学》中，他认为小说“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③。这些论述

① 费孝通：《乡村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转引自《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②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页。

都表明，梁启超认为小说具有开拓民智，变易风俗的巨大作用。严复与夏曾佑不再认为小说地位低下，相反，认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也不再认为小说只供消遣，而认为可以开拓民智，改良风俗，“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①更有甚者，西儒傅兰雅早在1895年6月就于《万国公报》上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一文，文中指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断：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②其意是征求旨在批判鸦片、八股、缠足的小说，革新小说的意识已经流露出来。因此，把“小说界革命”的时间上限确定在1895年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其下限，笔者认为确定在1917年比较合适，这时《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已经拉开。虽然此前的1912—1917年间的小说思潮和小说创作与1895—1911年间的小说思潮和小说创作有明显的不同，但二者仍然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此仅仅指出两个方面的一致性：一是小说思潮相一致。民国初年，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反思，认为：“质言之，则十年前之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也。忧世之士，睹其险状，乃思执柯伐

① 鄂国平、黄霖编著：《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②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载《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

柯为补救之计，于是提倡小说之译著以跻诸子文学之林，岂不曰移风易俗之手段莫捷于是耶？今也其效不虚。所谓小说文学者，亦既蔚为大国，自余凡百述作之业，殆为所侵蚀以尽。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焉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故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此事实之无能为讳者也。”^① 二是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小说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与嬗变性。就社会小说而言，谴责小说的末流“堕落”为后来的“黑幕小说”；就言情小说来说，晚清的写情小说开启民初言情小说之先河。文学史家阿英在论述晚清小说的特征时说：“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直至吴趸人创‘写情小说’，此类作品始复抬头，为后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开了先路。”^② 有的学者，如陈平原，在研究“新小说”时，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论述的，这在陈氏的论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论》（第一卷）中得到明确体现。陈氏和夏晓虹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其将起止时间确定在1897年与1916年，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只不过他们把起始时间追溯至《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发表，而不是《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刊登而已。至于“兴起与发展”是指小说界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等一系列过程。陈平原先生从小说理论的角度，把小说界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①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1905）。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